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俄罗斯鲁迅研究精选集 / (俄罗斯) 叶·谢列布里亚科夫, (俄罗斯) 阿·罗季奥诺夫, 王立业主编; 马轶伦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1.11

ISBN 978-7-5194-6322-9

I. ①俄… II. ①叶… ②阿… ③王… ④马… III.

①鲁迅著作研究 IV. ①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177768 号

俄罗斯鲁迅研究精选集

ELUOSI LUXUN YANJIU JINGXUANJI

主 编: (俄罗斯) 叶·谢列布里亚科夫 (俄罗斯) 阿·罗季奥诺夫 王立业  
译 者: 马轶伦

责任编辑: 章小可

责任校对: 王立业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106 号, 100050

电 话: 010-63169890 (咨询), 010-63131930 (邮购)

传 真: 010-63131930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rbcbs@gmw.cn](mailto:gmrb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3131930

开 本: 170mm × 240mm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2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6322-9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朴宰雨 (俄)  
鲁迅研究  
葛涛 (俄)  
鲁迅研究

< 俄  
< 俄  
< 俄

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  
俄中友好协会会长伊万·梅利尼科夫

### 祝贺信

在纪念伟大中国作家鲁迅诞辰140周年这一重要年份，我对《俄罗斯鲁迅研究选集》的汉语版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2021年，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庆祝《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众所周知，文学一直是联结世代与民族、加强各国人民友谊，并将其子子孙孙传递下去的强有力工具。伟大中国作家鲁迅深谙这一点，他不仅仅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俄中两国文学关系的先驱。鲁迅称俄罗斯文学为“导师和朋友”。

2021年6月17日俄中友协举办了“作家与思想家的讲述”纪念晚会，以此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鲁迅的形象永远让俄罗斯人崇敬，我们始终不渝地将鲁迅视为俄罗斯人民的真诚朋友。如今，在俄罗斯学术界我们已经为鲁迅写下并出版四部学术专著，百余篇学术论文，用俄语写成并出版的文集数量已逾20本。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鲁迅研究选集》是两国人文合作的成功范例，这本文集荟萃了我国汉学队伍研究中国杰出作家鲁迅创作遗产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我坚信，《俄罗斯鲁迅研究选集》的出版将为两国文学工作者学术合作的发展做出令人称颂的贡献。

(王立业 译)

# 鲁迅精神与文学世界在俄罗斯的 传播与影响

叶·谢列布里亚科夫·阿·罗季奥诺夫

(俄罗斯, 圣彼得堡大学)

## 鲁迅作品的俄文翻译

苏联汉学界一直视鲁迅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因此,鲁迅的文学作品与书信文章自然成为最早被译成俄文的中国现代文学文本之一。在俄苏至少有407篇鲁迅的作品和文章被译成俄文(其中175篇是信件)。在中国20世纪的作家当中,鲁迅也是第一个拥有俄文单行本文集出版的人,自1929年至今共有20本鲁迅作品选集问世,其总发行量高达1463225册(其他作家,如老舍文选在俄苏一共有22个版次,发行量约为1014700册;张天翼文选有11本,发行量为862000册;茅盾文选有13本,发行量为680600册;巴金文选有7本,发行量为555000册;郭沫若文选有11本,发行量约为460000册;叶圣陶文选有3本,发行量为210000册)。

不过,鲁迅作品的翻译与出版于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其间体现了20世纪中俄两国关系的亲疏与俄苏读者对中国文学态度的变化。

鲁迅的文学在俄苏共有5个活跃时期，即1929年、1938年、1945年、1954—1955年和1971年。

1929年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了由瓦西里耶夫(Б.А.Васильев)编选的题为《阿Q正传》的鲁迅小说集，该书发行量为3000册。该选集收录了《呐喊》中的《阿Q正传》(瓦西里耶夫译)、《头发的故事》、《孔乙己》、《风波》、《故乡》、《社戏》[以上均为什图金(А.А.Штукин)译]6篇小说和《彷徨》中的《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卡扎克维奇(З.В.Казакевич)译]两篇小说。这本书的问世与瓦西里耶夫1924—1927年被公派到中国当翻译有直接关系。这个时期他认识了曹靖华，得益于曹先生的推荐瓦西里耶夫阅读了鲁迅若干作品，并与鲁迅建立了通信联系。1925年鲁迅先生为《阿Q正传》的俄文版撰写了序言和自叙传略，由此可见瓦西里耶夫策划在苏联翻译出版《阿Q正传》，其完成时间比实际出版时间起码早了4年。该作品选无论是译文准确性还是作品修辞风格的传递都甚为成功。当时苏联《新世纪》杂志发表弗里德(Я.Фрид)的评论文章，称：“鲁迅是最好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而且在海外也很有名气。他对中国农村的了解，描写日常生活微小细节的才华，以及作品中恰如其分的讽刺和抒情意味，使得这位文学家的作品对欧洲读者也产生了吸引力。”

同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以5000册的发行量出版了科洛科洛夫(В.С.Колоколов)编选的题为《正传》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该选集除了其他作家的作品，同时收入了科金(М.Д.Кокин)译的《阿Q正传》和《孔乙己》两篇鲁迅小说。据译者个人经历推断，这本文选翻译完成的时间应该不晚于1927年。应该指出，科金的译文虽然语言流畅，但存在诸多理解或用词上的错误，并对《阿Q正传》的文本做了较多删除。因此，瓦西里耶夫对这一作品集给予了

较为负面的评价。

但尽管如此，上述两本书的问世无疑标志着文学家鲁迅已经走进了苏联读者视野。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若干单篇杂文和其他单独作品常常见诸了各类苏联报纸杂志，尽管数量不算多。下一个翻译热潮是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享有广泛的国内外声誉。1938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出版了《鲁迅（1881—1936）：纪念伟大的中国现代文豪论文译文集》，其发行量达到了10225册。这本文集除了对鲁迅的评论以外，还收入了几篇小说和散文，其中包括选自集体译作《呐喊》中的《阿Q正传》[书中说明，这是集体完成的，由鲁多夫（Л.Н.Рудов）、萧三、史普林青（А.Г.Шпринцин）编辑的译文，但仅凭文字就可以推断出这本书实际上是1937年受到镇压的瓦西里耶夫的译作]、什图金译的《白光》和《端午节》，还有选自什图金译的《彷徨》中的《示众》和《祝福》，选自什图金译的《野草》中的《狗的驳诘》，选自什图金译的《故事新编》中的《奔月》。此外，还有萧三译的《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等。尽管凯瑟尔（М.Кессель）在纪念文集的评论中严厉批评了什图金译文的艺术性不够到位，但这些译作在修辞风格上其实很接近鲁迅的原文（参见5）。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首次介绍给苏联读者的鲁迅作品译文后来差不多都没有再使用，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译文有多大的缺点，而是各位译者颇为悲剧的政治命运。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肃反时期，瓦西里耶夫和科金于1937年被枪毙，卡扎克维奇和什图金于1938年被捕并分别被判处流放和劳改。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几位汉学家没获得平反之前，其译作是不可能公开再版的。

苏联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于“二战”之后再度活跃。1945年，作为苏联最重要出版社之一的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以10000册发行

量出版了《鲁迅作品精选》。所收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从没有被翻译过的，如《彷徨》中的《肥皂》和《在酒楼上》两篇小说；《野草》中的《秋夜》《求乞者》《风筝》《立论》4篇散文；另有鲁迅写于同时代的杂文和信件。此外，该文集还收入了《阿Q正传》《端午节》《孔乙己》《明天》《白光》《一件小事》《故乡》《狗的驳诘》等新译篇目，其中不少后来被当作鲁迅作品经典翻译篇目多次再版。这本书的译者除了“二战”前参加鲁迅翻译工作的科洛科洛夫、兹德涅耶娃（Л.Д.Позднеева）、费德林（Н.Т.Федоренко）以外，加上了罗戈夫（В.Н.Рогов）、艾德林（Л.З.Эйдлин）、齐赫文斯（С.Л.Тихвинский）和瓦希科夫（В.В.Васьков）等一批优秀翻译家。事实上，这本选集已经成为1971年以前由费德林、艾德林、罗戈夫编选的其他鲁迅文集的基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罗戈夫编选鲁迅选集除了拥有苏联版本，还曾在中国出版过。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10年，苏联大力度出版鲁迅著作，其工作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这无疑与苏中政治关系密切有关。1954—1955年国立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波兹德涅耶科洛科洛夫、西蒙诺夫（К.М.Симонов）、费德林编选的四卷鲁迅文集，其发行量为30000册。这本作品集收入了1945年文集文，另外通过补充翻译纳入了鲁迅所有的小说、散文、主要的和信件等各类文体作品390篇，其中小说、散文与杂文215篇，信件175篇。可以说，这本文集出版以后，鲁迅作品虽然还没有全部译成俄文，但翻译的规模和广度是比较令人满意的。除了1945年文集的译者以外，参加四卷本翻译的还有彼得罗夫（В.В.Петров）、帕纳修克（В.А.Панасюк）、马努欣（В.С.Манухин）、申娜（Э.М.Яншина）、罗加乔夫（А.П.Рогачев）、华（Д.Н.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和菲什曼（О.Л.Фишман）。不过，绝

的译作由波兹德涅耶娃、科洛科洛夫、彼得罗夫、罗戈夫4人完成。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大量鲁迅文集的翻译文本大都源自该四卷本文集，新的译作非常少，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64年的《鲁迅讽刺故事集》。它收入了波兹德涅耶娃新译的《理水》《非攻》《奔月》3篇小说。另外，《外国文学》(1961, № 10; 1966, № 10)、《星辰》(1961, № 10)等杂志发表了一部分1954—1955年文集未收入的鲁迅杂文、诗歌和散文。

国立文学出版社筹划的《鲁迅中短篇小说卷》于1971年被列为“世界文学丛书”出版，这是当时最具权威的出版系列，又一次推动了鲁迅作品译文的更新工作。要知道，只有被公认为世界文学经典的文豪才有资格入选这部丛书，而在中国20世纪的文人当中，鲁迅是唯一享受这个殊荣的作家。《鲁迅中短篇小说卷》囊括了《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4本文集，另外还有早期小说《怀旧》。此前多次再版由波兹德涅耶娃、科洛科洛夫、帕纳修克翻译的《彷徨》和《故事新编》现由加托夫(А.Г.Гагов)、谢曼诺夫(В.И.Семанов)、索罗金(В.Ф.Сорокин)、索罗金娜(Т.Н.Сорокина)、苏霍鲁科夫(В.Т.Сухоруков)的新译所替代。考虑到新旧译文的艺术价值实际上不相上下，这次更新更多取决于编选者的爱好和旨趣，而不具备多大的客观需要。应该说，1971年新译的译作结束了我国对鲁迅创作的翻译时代，此后至今再没出现任何新译。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鲁迅作品都是根据“世界文学丛书”所收译文编选的。颇有意思的是，最近一次，即2002年出版的《中国20世纪诗歌小说集》，其中鲁迅的《故乡》采用的竟是波兹德涅耶娃早在1945年的译作，并非苏霍鲁科夫1971年的译文。

据我们的统计，有29篇鲁迅小说和散文，其中还有一篇自传，有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译文。

表一 具有多种俄译本的鲁迅作品

译作次数	该类作品的数量和名称
5次	2篇:《阿Q正传》《祝福》
4次	2篇:《故乡》《奔月》
3次	8篇:《自叙传略》《黎水》《铸剑》《补天》《非攻》《一件小事》 《社戏》《孔乙己》
2次	17篇:《起死》《采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狗的驳诘》 《孤独者》《兄弟》《长明灯》《肥皂》《示众》《高老夫子》《幸福的家庭》 《端午节》《风波》《明天》《头发的故事》《药》《白光》

同一篇文学作品存在着好几个译本,除了力求译作完美(例如,波兹德涅耶娃不但对自己的译作予以修改,甚至还重新翻译。她在1941年和1945年发表的《故乡》译作就是各自独立成篇的,二者没有承继关系),还会有翻译本身以外的其他较为悲催的原因。

在译成俄文的400多篇鲁迅作品中,42篇发表过5次及以上,后者包括《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集所有小说,《野草》集的9篇散文,《且介亭》集的1篇散文和鲁迅自传。收入下列图表的15篇小说具有10个及以上的版本。

表二 俄苏出版最多的鲁迅创作

排名	作品/文集	版本次数/翻译次数
1	《阿Q正传》/《呐喊》	21/5
2	《故乡》/《呐喊》	20/4
3	《孔乙己》/《呐喊》	19/3



续表

排名	作品/文集	版本次数/翻译次数
4	《一件小事》/《呐喊》	18/3
5	《明天》/《呐喊》	16/2
5	《在酒楼上》/《彷徨》	16/1
6	《祝福》/《彷徨》	14/5
7	《社戏》/《呐喊》	12/3
7	《风筝》/《野草》	12/1
8	《风波》/《呐喊》	11/2
8	《立论》/《野草》	11/1
9	《药》/《呐喊》	10/2
9	《幸福的家庭》/《彷徨》	10/2
10	《狗的驳诘》/《野草》	10/2
11	《秋夜》/《野草》	10/1

这些在俄罗斯最受欢迎的鲁迅作品中，有8篇出自《呐喊》，3篇出自《彷徨》，4篇出自《野草》。

由此可见，鲁迅创作中最能引发编选者、出版者和译者兴趣的是其突出反映中国人内心世界和中国社会的小说。至于鲁迅的杂文，它虽然大部分被译成俄文，但是再版的很少，因为苏联读者大多客观上不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文学和政治论战，所以只有汉学家才对它们产生兴趣。

鲁迅的作品在苏联的出版进程大体上与翻译活跃时期是一致的，也具有同样的历史背景。

表三 苏联鲁迅作品俄文单行本的发行量(单位:册)

	文集 1	文集 2	文集 3	一年小计	总量
1929	3000			3000	1463225
1938	10225			10225	
1945	10000			10000	
1950	150000	150000	30000	330000	
1952	90000			90000	
1953	90000	75000		165000	
1954	30000			30000	
1955	100000			100000	
1956	90000			90000	
1959	15000	10000		25000	
1960	5000			5000	
1964	30000			30000	
1971	300000			300000	
1981	75000			75000	
1986	100000			100000	
1989	100000			100000	

表四 鲁迅作品单行本在不同年代出版情况

年代	版本次数 (изданий)	发行量 (册)
20世纪20年代	1	3000
20世纪30年代	1	10225
20世纪40年代	1	10000
20世纪50年代	11	830000
20世纪60年代	2	35000
20世纪70年代	1	300000
20世纪80年代	3	275000
20世纪90年代	0	0
21世纪初	0	0
总共	20	1463225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统计只涉及鲁迅作品的俄文单行本，而不包括苏联和俄罗斯出版的大量中国20世纪文学集体文集中所收入的鲁迅创作。不过，后者的出版趋势与前者是一样的。

苏联出版鲁迅作品的高潮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很愿意出版友好伙伴中国的文学作品。苏中关系一冷冻，出版行情就出现了急剧下降。不过与政治趋势正相反，鲁迅创作被纳入这一时期出版的“世界文学丛书”，这就多少掩盖了当时并不乐观的文学交流现状。20世纪8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其矛盾的缓和，又为鲁迅作品的再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它还是没有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规模。应该提到的是，20世纪50至80年代鲁迅文集4次由儿童文学出版社以大发行量出版，目标读者主要针对高中生。此事证明，苏联对鲁迅文学的道德伦理价值有着极高的评价。

至于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20年间没有发表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体现了俄罗斯读者大众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兴趣的下降。文学出版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更愿意出版比较畅销的大众文学。令人遗憾的是，年轻的俄罗斯读者绝大部分没听说过鲁迅及任何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名字。不过，我们坚信，鲁迅创作对我国当代读者完全保有高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其苏联时期的译文绝大部分也仍然是不朽的。

### 对鲁迅创作的研究

苏联出版的每一本鲁迅文集都附有介绍其生平和创作历程的序言，1938年的纪念集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鲁迅的创作。此外，苏联汉学对这位中国现代文豪的创作还进行过规模更大的研究。如费德林著的《中国现代文学记》(1953)、《中国文学》(1956)，艾德林著的《论今日中国文学》(1955)等概述性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陆续问世。在这些著作当中对鲁迅创作的论述均占有重要位置。

此后不久，苏联汉学家相继发表了5本专门研究鲁迅的重要专著，即纳入“优秀人物传”丛书的波兹德涅耶娃著的《鲁迅》(1957)、索罗金著的《鲁迅世界观的形成过程(早期杂文与〈呐喊〉集)》(1958)、波兹德涅耶娃著的《鲁迅：生活与创作(1881—1936)》(1959)、彼得罗夫著的《鲁迅生活与创作记》(1960)、谢曼诺夫著的《鲁迅和他的前驱》(1967)等。

上述专著的突出特点是对鲁迅文本的深入研读，著述者都是鲁迅小说、杂文、信件的权威译者，翻译的严谨性要求他们深入了解作家的创作与心理状态、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手法。苏联学者在翻译和研究中也都参考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对鲁迅的评价与看法。在分析鲁迅的创作遗产、他的思想和审美立场演变的过程中，苏联的研究者务必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变迁、意识形态的斗争、革

命运动的发展等。虽然他们比较重视探讨鲁迅创作的思想内容，但从不忽视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总会涉及其创作艺术。

### 鲁迅世界观的研究

文学的历史经验让俄罗斯汉学家相信，他们之所以应该重视作家的世界观，是因为世界观首先决定创作的思想内容和创作方法的性质。在1929年鲁迅文集的序言中，瓦西里耶夫指出：“对鲁迅而言，文学创作是一件教育大事：他对艺术的态度是功利性的。假如艺术为人类的利益而服务，他就全部接收。与此同时，他声称纯粹的艺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期都不会有，因为艺术家总是其国家和时代的产物。”（10，第5页）瓦西里耶夫形成了这么一个印象：“在政治立场上鲁迅是无政府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他把社会生活的旧形式视为多余的和有罪的遗迹，并持以嘲笑怀疑态度，由此获得了激进派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10，第5页）莫斯科1929年文集的序言是由哈尔哈托夫（А.Хархагов）撰写的，他曾因为一本小册子《中国在沸腾：哪些势力在中国斗争？》（1926）而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在他看来，中国新文学的社会内容“引人入胜，让人兴趣倍增，更不用说其引起的艺术兴趣。后者之所以让人越发感兴趣，是因为我国读者对中国写实文学根本不了解”（17，第3~4页）。中国历史学专家卡拉穆尔扎（Г.С.Кара-Мурза）在为《文学大典》（1931）第5卷撰写的题为《中国文学》的论文中表示，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人士“没有追求为革命服务，也没有说有革命的任务，但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并不小于创造社，其革命意义不仅不小，而且更大。经常被称为中国契诃夫的鲁迅是风俗派作家、写实主义者，他第一个把农村题材介绍到文学，非常鲜明地描写了被封建势力所

压迫的农民的贫穷、挣扎和无出路”(8,第249页)。在这些评论中不能不看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苏联文学研究的一些弊病,即过度简单化和直截了当地把文学现象与经济关系、阶级斗争、革命运动连在一起。这种现象后来被定为“庸俗社会学”,在苏联后来的文学研究中也尽量摆脱这种陋习。上述3篇论文可算为俄罗斯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创作研究的开始。

文学研究观点的演变对科学院1938年出版《鲁迅》纪念文集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这本文集的序言写道:“鲁迅的人生道路是革命家、思想家、人道主义作家的历程,他以文学语言不断地推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国的思想。他的历程就是从小布尔乔亚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走向革命、无产阶级、积极参与民族解放斗争的转变。”

为了适应苏联社会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日益关注的需求,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于1940年出版了阿列克谢耶夫院士(В.М.Алексеев)、杜曼(Л.И.Думан)、А.А.彼德罗夫(А.А.Петров)编选的论文集《中国:历史、经济、文化?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Н.А.彼得罗夫(Н.А.Петров)和萧三在论文中特别强调,作为伟大作家的道德和世界观特质的爱国主义决定了鲁迅的精神面貌。

1949年以后,苏联学者在研究鲁迅世界观的时候,首先注重再现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状貌,因为这是鲁迅政治思想和审美观念形成时期,同时也观照到鲁迅在日本留学的岁月。索罗金在1958年的著作中指出“鲁迅的启蒙思想一开始是爱国主义的,呈现民主主义的特质”(21,第27页),而“鲁迅对欧洲革命民主文学的推广具有巨大的根本性意义”(21,第45页)。波兹德涅耶娃1959年出版的专著第2章,题为《唯物主义者、启蒙家、革命家》,论及1911年前的鲁迅,其中写道:“鲁迅的应事观点与中国当时先进的

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相一致。他把推翻君主制度、改造生活中的一切作为目标。由他对社会物质基础的兴趣不难看出，达尔文学说和医学学习奠定与巩固了他的唯物观点，并有助于他把握正确的道路。”（14，第57页）B. B. 彼得罗夫把1909年前的时段作为鲁迅革命民主思想的形成时期，这一阶段为鲁迅整个后来的文学活动打下了思想基础。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一致认定，鲁迅认识到了革命的需要。费德林在1956年的《中国文学》中指出：“从一开始鲁迅就欢迎革命，期待着革命不仅推翻满族君主及有关制度，也对社会生活进行民主化。”

俄罗斯汉学家特别重视鲁迅1912年年底写成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戈雷金娜（К. И. Гольгина）在她的专著《中国文学理论》（1971）中有一章节，题为《鲁迅早期美学观点》，指出作家在客观上反对改良派对艺术的功利态度，“反对梁启超在政治小说理论上的观点，反对把艺术服从于狭隘政治目标的儒家传统思想”（3，第250页）。在波兹德涅耶娃看来，《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见证了“作家文学审美观点的演变，而且俄中文学思想的实际交流比汉学研究更早体验到了这一点”（3，第87页）。继而，波兹德涅耶娃进一步强调鲁迅的文学审美观与俄罗斯19世纪的民主派文学批评相接近，但同时这位研究家又经常违背历史主义原则，不时做出过度片面的结论。戈雷金娜在她1965年的论文中指出：“鲁迅的审美观是在英国浪漫主义理论、康德的审美观，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中国传统审美观的影响下形成的。”（2，第103页）应当予以高度评价的是切尔沃娃（Н. А. Червова）的题为《论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纪念作家诞辰90周年）》的论文（1971），该文首先介绍了鲁迅对西方艺术和审美认知的接受，鲁迅对拉斐尔、伦勃朗、高更等创作理念的理解，对卢梭、哈特曼、伏尔盖特、席勒、冯特、穆勒菲尔茨、朗格、

梅伊曼、闵斯特柏格等文艺理论家观点的掌握，主要得益于日本人的著作。“通过对不同类型文学的认识，鲁迅得出了明确的，但并不完整的结论。《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的理论观点只不过是简短的笔记，难免简单化和理想化。”（28，第95页）这位学者不止一次地与俄罗斯鲁迅研究先辈相论争，比如，她指出：“我们没有根据把年轻的鲁迅称作别林斯基审美思想的接班人（如波兹德涅耶娃），或把他视为写实审美的捍卫者（如索罗金、彼得罗夫、谢曼诺夫）。”

苏联意识形态的实际状况使得鲁迅思想与宗教关系的研究难以展开与深入。难能可贵的是，学者们并没有忽略鲁迅如何对待佛教的问题。他们指出，鲁迅对佛教的兴趣源于家庭宗教气氛和老派学者章太炎的影响。后者一方面提倡革命，但同时认为佛教也能救中国。作为第一个研究该问题的俄罗斯学者，彼得罗夫指出：“在章太炎影响下，鲁迅于1914—1917年认真地研究了佛经。”（13，第52页）彼得罗夫认为，“在鲁迅看来，佛经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

1914年鲁迅资助出版了在几百年间颇受中国老百姓欢迎的《百喻经》。波兹德涅耶娃曾特别指出：“根据其日记”，《百喻经》在作家所研究的古代图书中“与其他文本相比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和深研”（14，第101页）。孟列夫（Л.Н.Меньшиков）对此则持有不同的看法。1986年《百喻经》的俄文译本在莫斯科问世。译作与注释由古列维奇（И.С.Гуревич）完成。在为该书写的序中，孟列夫指出：“假如我们考虑到鲁迅在其文本中多次提到文学和人类思想的大作，尤其是叙事性质的作品，就可以看到他对《百喻经》的兴趣并非偶然。”（12，第45页）学者认为，鲁迅把《百喻经》视为对老百姓教训的文集，认为它是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占有一定位置的作品。

索罗金在他1958年写的《鲁迅世界观的形成过程（早期杂文与〈呐喊〉集）》一书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鲁迅跟1911年革命以前



一样主张民主启蒙，他还没有明白人类道德伦理规范是由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而过了10年以后，鲁迅的思想则有很大提高，“现在作家把革命行动直接视为群众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条件”。

对鲁迅生平的每个阶段，学者们都会去调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世界观演变的社会人士、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广泛代表。在以史实性和信息性一并见长的彼得罗夫专著中，作者深入分析了鲁迅对人民的态度。他指出，作家虽然忧虑人民的命运，但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相信群众的革命动力。彼得罗夫写道：“他认为，农民不会自己争取自由，而年青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会替他们争取。”“不过知识分子经常胆子小，也缺少牺牲精神和走上新道路的决心。”“在这方面就出现了追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的行为经常辜负作家对其寄托的希望。”在描写伟大作家的時候，彼得罗夫突破了当时苏联文学形成的对先进人物的描写模式。学者笔下塑造的是一个有着丰富感情的人物形象。彼得罗夫指出，鲁迅在1925—1927年革命的前期仍然持有革命民主主义主张；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怀疑。对这一点，鲁迅曾以感人的真挚在《野草》集里做过描述。这本文集“不仅体现了鲁迅业已形成的理想和主张，也体现了其思想发展的过程，新主张的形成与旧主张的克服”。在激烈社会斗争年间鲁迅调整了他对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态度。“革命的现实彻底颠覆了他对进化论的信心，他的疑虑被革命群众必将胜利的信心所代替。”1927年10月移居上海以后，作家从小布尔乔亚的革命主张走上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立场。彼得罗夫和索罗金在评介鲁迅的世界观时还比较谨慎，而波兹德涅耶娃则很果断地坚持以下的结论：“鲁迅是一位少有的一辈子与中国革命运动紧密相连、密切关注其他国家的先进思想的人士之一。研究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列主义道路的过程，对于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历史颇有价值。”

苏联学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人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连续性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而20世纪在开创现代艺术世界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展开了有关保留或放弃某些古老精神价值的斗争。谢曼诺夫在题为《鲁迅及其前辈》的专著中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不少评论家倾向于低估鲁迅在中国文学上的创新作用，甚至批评他模仿别人。谢曼诺夫经常与西方的、俄罗斯的和中国的学者展开论战。他不同意说作家一开始就认为改良行动是“肤浅的和没有效果的”的看法，也不赞成波兹德涅耶娃关于鲁迅在南京时期就已主张革命的观点。这位学者探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作家的心理特点，并且致力于解释其人格的深层。他说：“鲁迅是一个思想很活跃，并且充满矛盾的人。他的错误有时候不是错误，而是新的富有成效思想的种子。”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东方学家越来越摆脱意识形态的枷锁，对东方作家创作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放弃了以往的偏见和简单化态度。这可以艾德林为“世界文学丛书”鲁迅卷（1971）所作的出色序言为例。艾德林不套用苏联汉学常见的世界观定义，而把道德视为鲁迅创作主要的并且是决定性的基础。他说：“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文学是离不开道德的，这是其特有的自然属性，我们对此不持异议。不过，不可否认，这个世界也会常常走极端，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道德感作家的发声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他们的言语应该具有非常巨大的力量，他应该相信真理在自己一边。鲁迅就是这样的作家，他也追求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精神文明大典》文学卷关于鲁迅的评说。索罗金指出：“作为与旧的‘封建’意识形态及其具有代表性的封建传统文化毫不妥协的对手，鲁迅还是主张继承古典遗产和民间艺术因素的。”索罗金通过对鲁迅生平事实的阐述重塑了客观的生活全景，并在一定程度

上介绍了鲁迅世界观的价值取向：“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文，开始与共产主义文化界的优秀代表如瞿秋白交往。他开始推广国内外革命文化，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及其文学界的代表。”

虽然今天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寻求建立新的思想和哲学问题研究方法，广泛使用与以往不同的理论术语和概念，但我们认为，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鲁迅的世界观，还是不应该忽视苏联汉学家的相关研究。